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民国文学史论 第五卷

李 怡 张中良 主编

国民党 文学思想研究

姜 飞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民国文学史论 第五卷

李怡 张中良 主编

国民党 文学思想研究

姜飞 著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1037)成果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 / 姜飞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10
(民国文学史论 / 李怡, 张中良主编; 5)
ISBN 978-7-5360-7155-1

I. ①国…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思想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5227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特邀编辑: 张灵舒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陈诗泳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贡日亮

书 名 国民党文学思想研究
GUOMINDANG WENXUE SIXIANG YANJI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2 1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总序一：还原民国文学史

张中良

不止一次听到质疑：既然现代文学史的概念早已获得公认，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提出民国文学史？

尽管存在着质疑，而且对民国文学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这个概念总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就扩大了探讨的空间。

民国文学史的概念，1994年见之于一套“中国全史”里的《中国民国文学史》时，只是参照历代文学史的分法，标志着一个时段，并没有涉及多少民国赋予文学的意义。现在，仍有学者持同样的理解。2006年，秦弓提出“从民国史视角看现代文学”，意在把现代文学还原到民国史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审视。2009年，李怡阐述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几年来，民国文学乃至民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渐凸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等举办的学术会议都曾就民国文学问题展开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广东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大学学报》、《文艺争鸣》、《兰州学刊》、《当代文坛》、《江汉学术》、《郑州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从讨论来看，民国文学史确有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所不能表征的独特而丰富的意涵，既然如此，“民国文学史”的梳理、叙述与阐释又有何不可？

在相当长的时期，民国是一个禁忌。人们每每把民国简化为一个败亡的政府，如果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表述的话，通常是“解放前”、“旧社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政府如果不腐败，怎么会被推翻？旧社会如果不黑暗，怎么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探讨民国问题呢？

然而，问题在于：民国在推翻了清朝政权、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建成，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而非历史的耻辱；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曾经寄托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民国是一个国家实体，有多种势力对峙、冲突、交错、并存的政治，有虽然地区之间并不平衡但毕竟曾经几度繁荣的经济，有由弱到强的外交，有终于赶走侵略者的抗日战争胜利，有大踏步发展的新式教育，有束缚与自由交织的新闻出版，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等等，怎么能够因为民国政府的最后败亡而抹杀民国的一切？民国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诞生到成长再到衰败，怎么可以由其结局否定此前的所有历史？

即使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不能无视民国的存在。中国向来有后世修史的传统，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入其中，然而，1957年的“反右”使规划搁浅，在接下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政治形势下，民国史研究没有人敢于问津。关于民国时期政治史、经济史、口述史等资料经过整理面世一批，但没有一种以“民国”冠名。1971年9月13日三叉戟折戟温都尔汗之后，“文革”狂潮呈现衰势。1972年，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启动研究与编写工作。但在“文革”后期，学术研究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民国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① 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出版，敏感问

^① 参照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1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2—5页。

题的探索，均有可喜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4卷本）、李新担任总编的《中华民国史》（12卷本）^①等代表性成果先后问世，引领读者走近民国史的真实。

比较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民国文学的历史还原方面要落伍很远。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思考问题，怯于拓展新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还有人担心研究民国文学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历史已经走到21世纪，多少惨痛的教训才换来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可能固然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进步、民族的良知、人民的觉醒，如果有谁再敢倒行逆施，很难得逞。退一万步说，如果因研究民国文学而获罪的话，那么，社会一定是出了大问题，那时即使一言不发也有随时随地降临的危险。民国文学史研究的旨归，小则是要呈现真实的民国文学史风貌，丰富人们的历史认知，大则是要普及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保障社会稳步前进。

以新民主主义观点、现代性或20世纪眼光来梳理与阐释文学史，自然各有所长，但是民国文学在民国的背景下诞生、成长，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表现了独特的民国风貌，而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来看，从迄今出版的近600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来看，回避民国文学概念，便无法揭示文学的民国基因，因而，很难准确地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全图，也无法解释文学发展的复杂动因。

民国政治自始至终是一种多元化的政治。北洋政府时期，南北对峙自不必说，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客观上给新文学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期间不仅存在着尖锐的国共冲突，而且两党之外还有活跃的自由主义阵营、根基深广的民主主义力量，国民党内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派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①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但又各自保留着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新辟的敌后根据地与广义的国统区之别，而且在国统区内部，也有桂、粤、滇、晋等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这种多元化的政治是民国文学形成多样形态的重要原因。民国的法律，固然有其自身的缺陷，也存在着法律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巨大反差，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还是有一定的法律保障。若不然，鲁迅怎么能够在对教育总长的诉讼中胜诉、恢复了被免去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在他成为左翼作家之后，怎么能够躲得了牢狱之灾，继续他的著译事业？在“白色恐怖”与红色堡垒之外，还有广阔的灰色空间，于是，才会有色彩斑斓的民国文学。民国时期，尽管确有政治压迫与文化管制，但就整体而言，民国文学没有大一统，没有清一色，不仅内蕴丰盈复杂，而且审美风格也是千姿百态。这就是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应是民国时期文学的总称，就文体而言，不仅有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也有传统形式的旧体诗词、戏曲、文言小说、文言散文，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改良体；就政治倾向而言，不仅有官方倡导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也有共产党人倡导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还有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就创作方法而言，不仅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还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方法的杂糅重构；就审美格调而言，有《凤凰涅槃》式的豪迈弘放，也有《义勇军进行曲》式的慷慨雄壮，还有《再别康桥》式的缠绵悱恻；从喜剧风格来看，有鲁迅浙东式的冷隽幽默，也有李劫人式的麻辣川味，有老舍杂糅着京味儿与英国风的月色幽默，还有张天翼式的湖南辛辣讽刺；就城乡文明倾向来看，有新感觉派式的斑驳陆离的都市色彩，也有沈从文式粗犷与清新交织的湘西风光，还有赵树理最为典型、叙事偏于传统的乡土通俗，等等。气象万千的文学风景，无论是其内蕴，还是其形式，都在民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都与民国的机制息息相关，因而民国

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外部研究，而且含有审美机理的内部研究。

民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与李怡教授曾经交流过，我们都认为，一部成熟的文学史著作应该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与其现在匆匆忙忙地“凑”一部民国文学史，毋宁脚踏实地地考察民国文学与民国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文化、教育、自然灾变诸多方面的关联，考察文学所表现的民国风貌，考察民国文化生态对民国文学风格的影响（或曰民国文学审美建构不同于前后时代的特色），然后再进行民国文学史的整合性的叙述与分析。现在，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民国文学史论》（6卷）只是实现构想的第一步。我们为遇到花城出版社这样的知音而备感欣慰！由衷地感谢花城出版社的宝贵支持！

我们不去奢望将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叙述仅由民国文学史来承担，那样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大一统式的构想本来就是与学术自由相背离的。但我们相信，民国文学史的叙述必定会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2014年3月22日于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寓

总序二：民国文学史，如何立论？

李 怡

如果不算海峡对岸对“民国”概念的使用，“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已经超过15年了^①，先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而后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今天，伴随着新一轮文学史写作的潮流的出现，人们对民国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两种期待，一是希望尽快见到一部《民国文学史》，似乎只有这样的通史架构才能显示民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成效，才能够与当前各种“现代文学史”版本相抗衡；二是深入展开各种题目的民国文学现象研究。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漫长的“治史”传统，在一个宗教裁决权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国度，人们倾向于相信，通过历史框架的确立可以达到某种裁决与审判的高度，所谓“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②。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于1951年，奠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集中代表了拨乱反正过渡时期的文学史观，无论是推重其稳健扎实还是诟病其保守落伍，都绕不开这三卷大著，甚至也部分激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欲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因为体现了新时期的现代文学视野，早已经成为

^① 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国文学”设想出现在1997年（陈福康），最早的理论倡导出现在21世纪初（张福贵）。

^②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

中国高校最普及的文学史著作；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实践了他的“重写”理想，被视作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之一；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生动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术研究的“历史化”取向，堪称经典之作；为了挖掘“文学之外”因素的文学史价值，吴福辉独撰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①；最近，则有钱理群总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问世，这是为了展示那些为传统研究所忽略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及其他社会文化环节，从而丰富文学叙述的图景：“从广告出发，就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还关注文学创作的语境和接受，关注广告所揭示的典型文学现象，关注广告背后的文化活动、文学事件、文人生活和交往，包括文人之死……这些都是以往的文学史不涉及，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叙述的，却恰恰成为我们的最大特点，并会有自己的独立发现。”^②今天，为了证明“民国社会历史框架”具有特殊的文学视野价值，势必应该编写一部扎实厚重的《民国文学史》。

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史编写的工作显然重要却又不可操之过急，因为，今天所倡导的“民国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以“民国”替代“现代”），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调整：正视民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不简单流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世界史”判断；发掘民国历史的若干细节，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具体语境；解剖民国精神的独特性、民国文本的独特性，凸显而不是模糊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空前绝后”的形态。这样的研究，从大的历史框架的设立与理解到局部事件的认定和把握，乃至作为历史事件呈现的文本的阐释都与此前我们熟悉的一套方式——革命史话语、现代性话语——有所不同，如果只是抓住名称大做文章，

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钱理群总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总序》第3页。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结果必然很快陷入到业已成熟的那一套知识和语言中去，所谓“民国文学史”也就名不副实了。早在1994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中国民国文学史》，这个奇特的书名——不是“中华民国文学史”而是“中国民国文学史”——显然反映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禁忌，因为这一禁忌，所谓“民国”的诸多历史细节都未能成为文学史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所以最终的成果还是普遍性的“现代化”历史框架，“中国民国文学史”的主体还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历史性质、文学意义的描述都依然如故，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补充：民国建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几年。

当然，也有能够“正视民国”的文学史版本，如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问题是，它要维护的中华民国依然是以国民党统治为唯一合法性的“党国”，民国社会历史的真正的丰富与复杂并不是它关心的对象。^①

以民国历史的丰富性为基础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叙述，始终是一个难题，对大陆如此，对台湾也是如此。

如果试图将海峡对岸的文学创作也囊括其中，民国文学史的完成可能又增加了一个难度：如何描述海峡对岸当今的文学状况，是排除于“民国文学”还是继续延伸，排除于现实不符，纳入却也同样问题重重，不仅有悖于大陆的基本政治理念，就是在当下的台湾也纠缠不清，继续奉“民国”之名的台湾目前正大张旗鼓地推进“台湾文学”甚至“台语文学”，所谓“民国文学”至少也不再是他们天然认同的一个概念，“民国”之说暧昧而混沌。

凡此种种，实际上是为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在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民国社会历史中影响文学的因素展开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对民国文学历史的一些基本环节（如民国建立初年的文学变迁、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民国意义、民国主导意识形态中的党派分歧及文学意义、民国社会制度下的文学生态等等）与具

^① 尹雪曼主编：《中华民国文艺史》，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阐述和研究，至于若干因为各种原因成为“著史”难题的课题则暂时搁置（如20世纪下半叶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的关系问题），总之，并不急于构建一部完整系统的民国文学史，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民国文学具体问题的梳理和认识之上，时间也集中于民国建立至共和国建立这一段“民国历史”的“典型”时期，历史的整体叙述有赖于更多更丰富的细节的完善，历史认识的深化也得益于更多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地发现，相信对民国文学现象持续不断的思考将有助于民国文学史整体描述的最后成型，有助于我们历史智慧的增长，而这样那样的难题也有希望在历史智慧的增长中获得最后的解决。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套名为“民国文学史论”的著作，所谓史论，也就是对这一文学发展现象的多角度的梳理和分析，通过这些梳理和分析，民国历史文化视角中的文学景观才可能更加清晰，新的细节才得以凸显，最终，新的历史演进的逻辑才逐渐清晰起来。丛书大体按照“观念论”、“方法论”、“形态论”、“史料论”、“结构论”及各大的方向勾勒“民国文学史论”的主要内容，张中良教授所著《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可以说是从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入手挖掘了它们之于民国文学发展的意义，属于“观念”的厘清；张福贵教授的论著从“民国文学”的理念出发重新认识文学史的诸多现象，从中为我们展现了若干“个案”的启示；陈福康教授一直致力于民国文坛的史料文献发掘，他为我们贡献了丰富的文学史的细节；李怡等著的《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文学》从民国社会形态出发阐述文学的生成发展；而周维东副教授和姜飞副教授的著作则分别考察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这正是民国文学的最基本的“结构”。当然，可以“立论”的民国文学现象还有很多，但以上这几个方面的考察却可以说大体架构起了我们解读、剖析民国文学现象的思想骨骼，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基点。

民国文学研究，也就是真正回到现代中国自己的历史过程，自我发现和自我展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将为大家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的景观，更有可能从中逐步形成现代中国学术自己的“方法”——一种以中国历史细节而不是外来概念为基础的认知态度，“作为方法的民国”将真正充实“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诸多内涵，而这正是中国学界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

以“民国文学史论”为起点，我们即将迈上更为辽阔的远方。

2014年4月于北京，

时届民国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半年之际

| 目 录 |

总序一：还原民国文学史 / 张中良 / 001

总序二：民国文学史，如何立论？ / 李怡 / 006

引论 / 001

第一编 原道、征圣和宗经

——孙中山的学说与国民党文学思想

一、民生史观 / 011

二、互助与仁爱 / 018

三、行易知难 / 024

四、民族主义 / 030

五、从孙中山的学说到国民党文学思想 / 036

第二编 民族、时代和环境

——国民党文学思想的观念以及方法

一、从文艺政策到文学思想：三民主义文学 / 045

二、从文艺运动到文艺统制：民族主义文学 / 058

三、思想体系的建构：王集丛、张道藩、任卓宣 / 069

四、新写实与新浪漫的相关问题 / 092

第三编 反赤、反帝和修辞

——党派文人写作与国民党文学思想

一、黄震遐的意识形态叙述 / 121

二、万国安的《国门之战》与中东路战事 / 148

主要参考文献 / 172

后 记 / 176

目 录

100 / 总序
100 / 总序
100 / 总序

100 / 总序

总序 第一版

总序 第一版

110 / 总序 第二版

110 / 总序 第二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总序 第二版

总序 第二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110 / 总序 第三版

引 论

1931年，在批评黄震遐之类右翼“黄金少年”及其“民族主义文艺”的时候，32岁的瞿秋白指斥国民党的党派文人和党化文人为“狗有狗种”，“不要脸”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文艺中“露出他们的狗相”^①。而在此前一年，18岁的年轻人陶愚川在上海“四马路一带的小书局里”看到的则尽是“普罗文艺的嚣张”，左翼文人“穿的是西装，住的是高房大厦，他们有女人，有钱”^②，然而写的却是“阶级斗争，穷，起来，打倒”，他们热衷于从远方汇过来的“卢布”，身为“黄帝后裔”却“不要祖国”，跟着苏俄“乱吠”^③。

左翼和右翼文艺阵营之间的相互攻伐，动辄标识对方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激烈而至于谩骂，似此情形在在皆是，不起于瞿秋白和陶愚川，也不止于他们。“走狗”是忠诚的，同时，“走狗”也是主人的工具，左右两翼文人的此类挞伐，一方面相互描述了各自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忠诚，一方面也相互指明了左翼文艺和右翼文艺的工具性特征。然而，认定各自为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一党派的政治工具则可，相互指斥为各种“帝国主义”的“走狗”，却涉嫌妖魔化。如果追究历史，大略观之，则不论左右，也不论国共，最终都有民族主义色彩，并非赤白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左翼文艺和右翼文艺，至多不过是各自信仰的救国方案的忠实“走狗”而已。

① 史铁儿（瞿秋白）：《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 右翼文人大抵这样攻击左翼文人，而左翼文人的印证材料，可以参见黄药眠所著《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在上海》一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 陶愚川：《如何突破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时代》1930年第2卷第5期。

在一定意义上，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国共两党都是救国的政党，民族主义实为两党深度认同的“一种公共文化和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宗教形式”^①。如果我们的视野广阔一些，则可以发现，中国左翼革命阵营虽然在“中东路事件”期间呼吁“武装保护苏联”，但却最终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转向了民族主义，投身抗战，而且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与几乎所有以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为政治话语的政权一样，体现出向民族主义转化的倾向^②。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左翼和右翼的意识形态论述、对立和斗争，本身未必真的只是执迷于意识形态本身，或者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守也许只是表层话语，而在其深处，另有决定性的话语。其实，不仅在政治取向上，而且在文学表达上，左翼和右翼同样在分享民族主义，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前半期，左翼文学书写中一直有其民族主义的精神线索，并非以纯粹的阶级性叙述同右翼文学的民族主义鼓吹展开斗争，譬如蒋光慈和黄震遐，他们的文学叙述（不论是《冲出云围的月亮》还是《大上海的毁灭》）都反对帝国主义，甚至都在文本中讽刺、批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谓买办资产阶级。

观察历史的叙述。马克思曾将1840年确定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③，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意识形态史家也以那一年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思想家、领袖和史家，不分中外和左右，其历史分期的一致性指陈了那一历史转折点的近代意义。古典中国不敌近代西方，这一事实导致近代史在对中国被迫前行的历史过程的描述中，浓墨重彩地勾勒了一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线索，体现了历史叙述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力量，而考察意识形态史家的叙述重点，可知古典渐入近代的被迫进步不及中国不敌西方的奇耻大辱。近代史的民族主义叙述，既寓悲愤的民族情感于英国、俄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又不表同情于作为主权国家的“大清国”及其皇帝“威灵”之坠落。鸦片战争以

① [英]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③ 李大钊：《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8页。这是李大钊1926年翻译的马克思1862年发表于《纽约日报》上的论文，《中国及欧洲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国保藏的原状”，“一八四〇年英国的炮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灵，强迫了这天朝上国与俗野的世界相接触”，“分解必定随之而起，这与谨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论何时，一与空气相接，立即分解一样，是确然的”。